

文艺战士从军行^①

讲述者

钟德来（1930—），东莞大朗镇人。1944年2月参加革命，1949年6月入团、8月入党。历任东江纵队“东江流动剧团”团员、东纵宝安县大队部文书，解放后历任县青年团干，土改工作组组长，珠海前山区委书记，珠海县委委员、县委办公室主任，县渔业部部长，县委宣传部长；1958年后历任中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，沙溪人民公社第一书记，“五七干校”队员，担背革委会副主任，县“五七干校”革委会主任，县科技局局长、科委主任，县旅游办公室主任、旅游委主任、旅游公司总经理。1991年离休。



钟德来

姐姐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

我于1930年3月出生于东莞县大朗区，即现在的东莞市大朗镇。这个现在以篮球著名的地方，在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已经算是革命老区。在我家乡附近，有著名的大岭山革命根据地。按照东莞的习俗，过了大年初七新年就算过去了。我就是在1944年2月春节，吃完新年饭后参加东江纵队的，当时只有14岁。我今年84岁，这已经过去了整整70年。

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我的姐姐。当时姐姐已经参加了东江纵队，

^① 根据中山市委党史研究室2014年4月14日采访钟德来整理。采访者黄春华、林伟桦、邱霖巧；林伟桦整理。采访地点为中山市委大楼722室。

在政工队，搞政工宣传。我未来的姐夫也在东江纵队。那年我小学毕业没有上初中，在家捉鱼、斗蟋蟀。姐姐每次从部队回家，就给我们讲革命故事，教我们唱革命歌曲。我记得，她讲过两万五千里长征，讲过毛泽东领导人民干革命。我第一次听这些，听毛泽东的名字，深受熏陶。幼小的心灵已经播下了革命的种子。

春节过后，东江纵队“东江流动剧团”到我家乡演出。这是个文艺团体，隶属于东江纵队第一支队政治处。看到剧团的团员们都穿制服——中山装，唱歌时整齐划一，一下子激发了我的革命热情。我年纪小，个头不大，不敢去战斗部队，于是就想参加剧团，当文艺战士。就这样，我在1944年2月就去了东江纵队“东江流动剧团”，踏上革命道路。

从1944年2月至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，我在东江纵队大约1年半时间。在这短暂的时间里，经历了3个单位。这对我整个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，也使我终生难忘。第一个单位是“东流剧团”（简称“东流”），团长是谭军。后来东纵北上后，他在山东随两广纵队南下，任两广纵队文工团副团长，新中国成立后任珠江电影制片厂总编导，是个比较早参加革命的文艺骨干。副团长萧英，是个男同志，抗战结束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，北上时牺牲了，是个烈士。剧务主任林瑜，建国后任广东粤剧院副院长，曾经9次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。他编过著名的《花蕊夫人》一剧，现已90多岁，居住在广州。全团四、五十人，除了谭军、萧英、林瑜几个中年人外，其余都是青年人。我入团后就跟着老大哥们唱唱跳跳，学唱歌跳舞。剧团在排练时，团长谭军经常拿一个算盘，噼啪打拍子当指挥。吃饭用的是口盅。口盅的功能很多，可以用筷子敲打着做拍子，当排练和演出道具。我和林庄（当时不知具体名字，只知道叫林女，现在在北京）两人年纪最小，参加剧团最迟，因此没有发中山装制服。当时中山装的材料都是从香港运过来的。团员们都叫我钟仔。排练的节目有唱歌、跳舞、魔术等。唱歌时，我和林庄就跟着大队伍，有点东郭先生滥竽充数的味道，但我没有排过剧。由于缺乏器具，我们日常的文娱活动就用旧报纸一层层包起来当球类，日子过得生动活泼。

“东流”在东莞宝安交界处的大朗、金桔岭、大塘、黄松岗一带活动。我们经常行军去演出。初来部队时，家里给我一个包裹，里面有两套暖衣

和两套内衣，叠得四四方方，还有一张毯子。用绳子将包裹和毯子一卷，扛在肩上，腰上系一条毛巾、一个口盅，就这样一身行头行军。“东流”没有武装，我们跟着武装部队走，受武装部队的保护。我们的主要任务一是为部队指战员演出，二是为当地老百姓演出。在这几个月时间里，我的生活非常活跃，还经常跟着团长谭军去拜访兄弟政工队，交流文艺节目。

革命人生第一课：整风运动

1944年5、6月间，“东流”在东莞县大王岭村开展整风运动。20世纪40年代的整风运动，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，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。上级派到“东流”主持整风运动的，是东纵一支队政治处一个女同志，叫赵学。大家对她很尊重。她解放后曾任广东省体委副主任。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，老区周围比较稳定。整风运动持续了将近20天。

赵学同志带来整风三大文献：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《整顿党的作风》《反对自由主义》，都是油印本。团员们平时很活跃，那十几天完全变了样，个个很严肃，吃完饭就学习整风文献，很安静地听。我年纪小，对整风运动的一切感到很新奇，跟着大家坐着静静听。学习文献后是对照检查、自我检查，批评与自我批评。有些领导同志受了批评，做了检查。我入团才3个月，没什么可以检查的。然而单是接受教育，也常常让我面红耳赤，震撼很大。

“有则改之、无则加勉；言者无罪、闻者足戒；知无不言、言无不尽。”诸如此类，我是第一次在整风运动中听到的。以后我在工作当中经过无数运动，整风运动是第一次，所以印象特别深刻。它对我一生影响深远，是人生第一课，使我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生涯能小心谨慎，畏惧纪律，畏惧法律。文学大师沈从文曾经讲过一句话：“永远学不尽的人生，而且，无从毕业。”我就是在东江纵队东流剧团，上了人生基础第一课，也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哺育的第一课。

战地演出：无限延伸的抗日战场

东流剧团在这次整风之后进行了改编。1944年6月，“东流”解散，

改编为政工队，代号“大丹河”（东江纵队很多单位都有代号），还是隶属于东江纵队一支队政治处。之后，我和姐夫调到东纵宝安大队。大队部代号“南江”，驻扎在宝安县洪田村。我在大队部当文书，负责统计人员、物资等，制成表格和报表报给上级。

还有一项工作，是空闲时下连队教战士唱歌。教唱歌我有经验，“东流”几个月的锻炼为我打下了基础。我记得当时教的歌曲有《黄河大合唱》等。有一次，下到驻扎在长圳村的连队。那时年纪虽轻，但我面对整连的战士们毫不畏惧，拿着指挥棒打节奏，有模有样。连队的战士们都跟着我唱，氛围很好。其中有个战士却总是不唱，只顾说话聊天。我几次提醒要集中精神，他就是不听。我想出一个办法，到最后教唱结束时，请那位战士站起来，请他对着全连队战士独唱。他说不会唱，我就批评他：“刚才我在教，你不认真跟着唱，现在又说不会，以后别这样了。”现在回忆起来，那时的我很淳朴，年纪小却胆量大，大概是当时的抗战氛围让我产生一种责任感，这种责任感与年龄无关，与部队氛围和教育有关。

我在宝安大队还学会了走群众路线，与群众打交道。我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和农村工作，参加过土改、征粮队，学会做群众工作，很有实际意义。宝安那边的情况我比较熟悉，因为经常要走路去连队教唱歌。大队为了保护我，曾经配发一支左轮枪给我，没有枪壳，只有几颗子弹。但我当时认为一支枪值几担谷，放我身上意义不大，所以就沒要。

就这样，我在宝安大队待了7、8个月时间，直到1945年2月。当年春节过后没多久，突然接到一支队政治处通知，叫我去燕川村报到。这是支队部驻扎地，一条几千人的大村子。到支队部后，政治处主任赵学对我说：“钟仔，你太小，经常要行军太辛苦。党在宝安水贝村办了间东宝中学，组织保送你去读书，培养你。”我对赵学主任说：“我没钱读书，家里没有学费给我。”赵学说：“学费和食宿费部队都帮你解决，你去读书就行。”

东宝中学是当时抗日民主政权东宝行政督导处兴办的。东宝行政督导处是广东省首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，成立于1944年7月。东宝中学于1945年2月间正式开学，地址在宝安县公明圩水贝村。当时是借用这条村的三间祠堂来当教室，中间的祠堂叫“高尔基室”，左边一间叫“鲁迅

室”，右边一间叫“邹韬奋室”。东宝中学参照陕北公学模式而建，是东宝地区乃至华南地区第一所民主中学。日本鬼子投降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，东宝中学被迫停办。中学在1987年抗战胜利42



深圳市公明中学的前身即为东宝中学。

周年和2005年抗战胜利60周年曾经举行过纪念活动。

这间中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建国后都起到很大作用。我党在抗战期间就能重视教育，重视人才，未雨绸缪，为以后培养人才，很不容易。毕业生中有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陈仁，中国科学院教授、研究员冼杏娟等。原广东省人大副主任方苞当宝安县委书记时，他的局委办负责人、公社书记绝大多数是从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。我们的班主任姓梁，新中国成立后任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。他毕业于广东艺术学校戏剧系，专门搞戏剧。在东宝中学期间，他成立“五四”剧团，编了2部5幕长的剧，一个叫《奴隶教养所》，一个叫《老虎九》。这两个剧在学校和东莞、宝安周边农村演出，很轰动。

东宝中学就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第三个单位。在东宝时我参加过战地演出。大概是1945年5、6月间，沙井还没解放。东纵部队与日、伪军在沙井新桥这个地方对峙。伪军的炮台用蚝壳筑成，实心且很坚硬。后来，东纵部队用土炮对敌人的炮台发起攻击。战斗结束后，“五四”剧团在部队的警戒下，在新桥战地演出。我们是打着赤脚行军去演出的，裤脚用绳子捆着。我和陈仁（当时他叫陈燕）、陈泽等边行军边聊天。到战场上，我看到蚝壳散落一地，可以想象战斗很激烈。那些战斗场面让我终生难忘。战地演出结束后，我们还去为村民慰问演出。演出的剧目就是《奴隶教养所》和《老虎九》。慰问演出引起了很大轰动，村民们热烈欢迎我们，杀鸡杀猪慰劳我们。我们在好几个地方都有演出。现在想来，虽然当时我们做的是非战斗工作，但从另一个方面对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转入隐蔽，蓄势待发
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，革命暂时进入低潮。组织让我回去读书、隐蔽下来、等待时机，同时坚持革命立场，等待革命事业的进展。1945年9月后，我跟家人回到东莞农村，后来考入东莞中学。方苞、谢明仁同志是我的同届同学。考东莞中学时，为了避免被国民党反动派追踪，我将名字改成现在的钟德来。当时东宝中学有个女学生回到东莞后被国民党逮捕，在监狱里被折磨致死，成为烈士。我在东莞中学于1949年6月入团，当年8月入党。在学校我很少公开活动，从不暴露曾经去过东江纵队和东宝中学的经历，甚至在入党时，我的地下党支部书记都不知道我去过东纵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才大白于天下。我重新投入到新中国新的革命事业中。

【延伸阅读】

大岭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

1938年10月11日，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后，东莞很快落入敌手。“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”、“东宝人民抗日游击队”等武装力量挺进大岭山区，把人民武装起来，逐渐形成了以大岭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。这块抗日根据地经受了严峻的考验，一直坚持到东江纵队北撤。

大岭山区在东莞县的中心，包括大岭山、莲花山和大屏障等山系，从北面向南迤迤曲折，形成一条弧形山脉，有建立抗日根据地、发展游击战争较为理想的自然条件。抗战爆发后，中共党组织先后派干部到此创建抗日武装队伍，发动和宣传群众，兴办民兵武装、夜校等，逐步奠定了浓厚的群众基础。1939年春，成立大岭山区委，完善了党的组织基础，为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蓄积有利条件。

1940年9、10月间，曾生和邬强率领“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”（简称“三大队”）回到大岭山区的大公岭，随后辗转到大环一带。日军300余人向大径附近的黄潭进犯。三大队进行反击，以伤亡10余人

的代价打响抗日部队返回大岭山敌后的第一仗，在群众当中影响很大。群众相信这是真正抗日的部队。黄潭战斗后，厚街、桥头、良平、篁村、大岭山以及莞城的很多知识青年和群众要求参加部队，部队很快发展到100多人。

1941年3月，三大队成立了民运部，部长叶锋，副部长高云波、范毅；刘萌和黄琴等在瓮窑建立了党的组织。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大岭山根据地党的组织和民运工作，中共东莞县委在当年5月重建大岭山区委，祁烽任区委书记。大岭山区委管辖除大岭山地区外，还包括莞太线的怀德等地。由于加强了党的领导，建政工作也迅速发展，开辟了东宝地区最早的抗日根据地，建立起东宝地区第一批抗日民主政权。乡级办事处有：塘朗乡办事处、连平乡办事处、杨西乡办事处、大沙乡办事处，并于5月建立了连平联乡办事处，把根据地扩大到靠近莞樟公路。大岭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，像一把匕首插在敌人胸膛。敌人拼凑反动地主武装，伺机反扑，大搞保甲制度。5月下旬，杨西乡牛头村的反动地主刘德、鸭屎岭村的汉奸张玉衡纠集飞蛾的李积仓、高田的蔡木生、连平的蔡子清、中围的李宝生、牛牯岭的李发、瓮窑的张富来等反动地主、土豪劣绅以及汉奸特务，勾结刘发如200多人进犯杨西乡，屠杀党的地方工作人员陈特等5人，制造了“杨西事件”。事后，三大队和自卫队奋起反击，镇压了为首分子张玉衡。在接连打击日、伪后，于6月中旬，三大队又取得“百花洞大捷”，保护了群众利益。部队很快发展到300多人；地方政权也发展到8个乡，在连平、大沙、塘朗、同沙、治平、怀德、杨西、宵边等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，组织抗日联防自卫队和许多民兵。这时，部队控制了宝太线、广九线以西的大片土地，使东宝解放区连成一片，初步建立了以大岭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。

政权的雏形建立起来后，一是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，实行二五减租；二是动员群众参军，扩大部队；三是组织民兵，每个乡都建立一个民兵中队，100人以上；四是处理一些民事纠纷。

从部队东移回到1941年9月，是大岭山根据地建立的第一个阶段。一年时间虽短，但抗日民主政权大力支援了部队，使部队发展到1500人。在部队控制的广九铁路以西，莞太、宝太公路以东，莞樟公路以南的大片

土地上，建立了后勤补给单位，修械所、税站和医院，组织了民兵和群众抗日团体，建立了抗日政权，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大岭山抗日根据地。

1943年12月2日，东江纵队庄严宣告成立，标志着东江地区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新的阶段，大岭山抗日根据地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。

1944年1月31日，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《建立东江抗日民主政权的原則》的指示。遵照这个指示，东江纵队首先在路西东宝解放区组建抗日民主政权。1944年7月1日，东宝行政督导处成立，谭天度为主任，何鼎华为副主任。督导处正式公布统一领导东莞、宝安路西解放区的根据地建设，同时宣布43个抗日民主乡政府成立。东宝行政督导处适应战争环境需要，机构精简，人员精干，下设政治、财政、民政、司法、宣传、税务等6个科和《新大众报》社，并最终发展为下辖8个区政权，近80个乡政权，人口约60万的抗日根据地。

为支援抗日，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发动群众支援和参加抗日；征粮收税，保证供给；搞好生产建设，领导群众度荒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；组织农会，开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等一系列活动。创办东宝中学就是其中一项。

1944年冬，东江纵队政治部为了培养抗日干部，决定由东宝行政督导处主办东宝中学，校址设在原宝安县的公明水贝村（现属光明新区公明办事处下村小学）。学校由3间相连的祠堂组成，建筑面积约1300平方米。此3间祠堂为下村社区陈氏宗祠，始建于明末清初，清末民初曾大修，是一座具有文物价值和革命传统教育意义的古建筑。1945年2月间，东宝中学正式开学，名誉校长为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。学校开始有两个班，后增为3个班，学生大约有100多人。1945年10月，东宝中学因内战被迫停办。1956年9月，东宝中学恢复办学。1960年9月，东宝中学更名为公明中学，现址在深圳市公明红花山。

（整理自《东江党史资料汇编》第二辑，中共惠阳地委党史研究小组、中共惠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，1983年。）